

# 国企改革要啃下硬骨头 人浮于事必须根治

【编者按】

随着地方两会陆续结束与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国企改革再次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目前，中国已经有 20 多个省份把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列为 2017 年的重点工作，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 徐骏

2 月 14 日，上市 18 年之久的武钢股份将正式从资本市场退出，但对于刚刚成立的宝武钢铁集团来说，国企改革则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专家指出，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享有的资源优势也让很多国企存在着产业结构落后、低效无效资产多、人浮于事等不少沉痾痼疾。推动国企改革，恰恰需要我们直面问题，撸起袖子加油干，敢于啃下这些“硬骨头”。

## 有舍有得的放矢

不破不能立，有舍才有得。国企要实现提质增效，必须敢于有的放矢地主动做减法。

日前，青海省国资委副主任陈志忠就明确表示，青海要建立健全省属出资企业国有资本退出机制，有针对性地兼并重组一批、关停出清一批、管理提升一批、改造升级一批、破产清算一批，推进国有资本退出不具

# 个税改革今年有望破题 首套房贷利息或纳入抵扣财税

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如果将这场改革比喻成一场马拉松，按照“2016 年基本完成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 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时间表，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正处于半程配速的关键期。

值此关键期，2017 年财税改革有啥大动作？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17 年财税体制改革定了调，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为了完成年度任务，财税改革该往哪儿使劲？有哪些难点和痛点？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 剑指“乱花钱”与“乱举债” 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大框架确立，多项税制改革加快推进

“在国家治理中，财税体制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有三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目前来看，前两项任务进展明显，很多改革措施已经落地见效。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石，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首要内容。抓住预算这一“龙头”，就等于牵住了改革的牛鼻子。这两年，预算管理制度的大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财政资金管理越来越规范，预算公开迈出新步伐，地方债务风险的“缰绳”越勒越紧。

比如，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 年两会上，“国家账本”中的四大预算齐“亮相”，一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就此建立。按照新《预算法》要求，政府的收入、支出和债务，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花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问题。

同时，加大各预算之间的财力统筹，将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更多地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我国政府预算体系包括四本预算，各有侧重和分工。相对而言，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主要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将资金更多地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意味着公共财政实力增强，政府可以更好地保障百姓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管理研究所所长李燕教授认为。

预算公开透明，百姓才能了解财政的钱花到了什么地方，花得是否合理到位。财政



备竞争优势、产能过剩及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行业和领域。

在“以舍促得”方面，中国其实不乏有益经验。针对旗下少数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和无效资产，中粮集团通过兼并重组、创新合作、清算注销等多种手段科学引导国有资本退出。例如，木材、水泥、羊绒业务实现了向相关专业领域国企划转；巧克力业务进行退出的同时加强与地产板块协同，盘活了土地资源。

“国企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而这通常建立在‘木业有专攻’的基础之上。前些年，一些国企盲目扩张、贪大求全，进入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低效无效资产，甚至严重亏损。因

此，只有科学甄别资产类型，因地制宜做好减法，才能轻装上阵，让社会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对记者表示。

## 职工安置做细做实

做减法，就难免涉及人员安置。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保障职工薪酬既关乎社会稳定、防控风险，又涉及改革惠民生的目的，也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前提。

杭钢集团所属半山钢铁基地关停工作是当地去产能的重点，其压减炼钢目标占全省降压计划的 49.5%。然而，这一过程需要涉及 1 万多人的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影响改革进程甚至社会民生。对此，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我国预算公开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公开法制框架基本确立。除单独公开“三公”经费预算外，公开范围由一般预算拓展到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单独公开部门收支预算拓展到公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等情况。

政府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同时，税改也成效显著。“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不仅直接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有力支持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且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对稳定经济增长和增强市场活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军表示，2016 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改革总体运行平稳、渐行渐好，成效好于预期。全年累计减税超过 5000 亿元，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2016 年，税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多项改革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实行从价计征，并在河北省试点开征水资源税。从改革实施情况看，改革运行平稳，企业税费负担普遍下降，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效应初步显现。此外，我国第一部“绿色税法”——环保税法出台，环保税将成为我国第十八个税种。

## 央地关系调整更精准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成今年改革重点

“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

整，亟待精确落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

那么，央地财政关系应当如何调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今年财税改革的重心。首先要界定政府边界，明确划分市场和政府、政府和社会关系之后，再来划分央地间财政事权，进而再确定央地收入划分、健全地方主体税体系。

“央地关系调整的传统思路是下移财力，这是不对的。未来应该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哪些事权上移，这要做大量细致工作，需要持续推进。”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现在已经超过 85%，中央本级支出不足 15%。中央支出比重如此之低，导致中央对地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有一定的风险隐患。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照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国务院已经出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总体要求、划分原则、主要内容。今年将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范围，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形成权责利清晰、更加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财税体制。

“要抓住改革时间窗口，及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提高改革精准化水平，

# 95 后“新蓝领”偏爱移动互联网

介专员。美容养生馆良好的工作环境，侧重于身体保养护理的专业素养，要求这个岗位比一般的美容师更专业，求职者面临的门槛并不低。而在北京，95 后所从事的职业中最高薪资的当属按摩师，平均薪资接近一万

元。赶集网负责人分析，像上海、北京这样发展快压力大的城市，负责为全民减压放松的市场很大，为很多新蓝领人群提供了很好的薪资空间。

榜单显示，95 后加入求职大军，整个人

杭钢集团专门成立综合服务公司，通过保障职工生活水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思想工作、分批解决职工再就业等种种努力，最终实现了改革的平稳推进。

“在不少产业结构单一的地方，往往一家好几口人在同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如果国企改革时对职工安置没有做细做实，那么很可能对这些家庭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周民良表示，相关国企需要做好改革节奏协调、就业信息发布等工作，而政府则要针对国企改革集中的地区和确实较为困难的企业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在高管薪酬改革后应进一步做好基层职工待遇保障。

## 人浮于事必须根治

即使是对于情况较好的国企而言，人浮于事问题同样是制约企业进一步提质增效的“硬骨头”。

不久前，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在会议上指出，省属国企管理层级多、干部多，一个煤炭集团相当于处级的一两千人都有，职工意见很大。王一新强调，对这样的问题和矛盾肯定不能回避，各单位都要当作工作重点去解决，制订分阶段目标，最核心的是不能养着闲官、拿着高薪。

在企业随意进人、人浮于事问题上，王一新表示要有明确的与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相挂钩的约束机制。他透露，在未来 5 年内，山西省国有煤矿原则上一律不新招聘普通矿工，而是从现有人员进行调剂。

周民良说：“近年来，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上下了不少力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需要看到，很多国企的人员结构依然对创新能力形成了制约。这就需要我们敢于引入竞争机制，加强优胜劣汰，特别是提升对外企和留学归国等海外人才的吸引力。”

（据新华社）

以钉子精神抓好改革措施落实。”肖捷说。

## 减税降费仍是主基调 个税改革有望“破题”，营改增减税规模有望达 7000 亿元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 5% 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认为，大规模减税降费，对实体经济肯定是利好，负担轻了，振兴的动力才会更足。

减税降费仍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主基调。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具体措施包括：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落实好其他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研究实施新的减税措施。同时，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

减税方面，营改增将继续担当重任。专家预计，今年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可能达到 7000 亿元。因为，去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是在 5 月份，时间只有 8 个月。2017 年则是一整年，四大行业减税存在翘尾因素，不动产纳入抵扣也有翘尾因素。两个“尾巴”一翘，全年减税 5000 亿元就打不住了。

深化税制改革，是社会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今年的税制改革内容，大致有这么几项：研究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配合做好烟叶税等税收立法工作。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如果前几年大家谈个税主要是从收入角度看，现在则更注重公平性，应该从家庭支出负担角度考虑，因此“增加专项扣除项目”就成了近两年讨论个税改革时的高频热词。专项扣除的可能性、扣除项目的设计以及扣除额度的核算方式等，都成为个税改革的焦点。

“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上，应研究决定专项扣除可能的方向。具体讲，就是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张连起说，比如在现行 3500 元和三险一金基础上，去年已在 31 个城市试点商业健康保险扣除政策。下一步，根据社会配套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可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比如，再教育支出、赡养抚养支出、首套房贷利息等支出，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李丽辉）

才市场逐渐呈现出了更加新鲜并且多元化的特点。在赶集网招聘发布的最受 95 后欢迎的职业前十名中，移动互联网相关的职业偏好明显高于其他传统职业。从 95 后简历投递量以及相关职位搜索浏览量的数据来看，对淘宝客服、淘宝模特、快递员等网络购物相关的职位简历投递量最高。

（佚名）

# 新出生人口 创 15 年来新高 中国劳动力过剩了吗？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总被批评人口过多，对世界资源的占有比例过大。但中国经济的强有力发展，却是十几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哪些变化？其对经济又有什么影响呢？

## 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总人口为 13.8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809 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 1786 万人，比上年多增 131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2.95‰，创下 15 年来新高，自然增长率为 5.86‰，创下近十年新高。

## 人口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全面二胎政策，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劳动力人口，从而改善劳动力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对资产价格又有什么影响呢？

资产价格的涨跌根本在于供需关系，而供需的背后都是人口在支撑。理论上来讲，当人多商品少的时候，需求旺盛，商品遭到哄抢，价格暴涨；当人少商品多的时候，供给过剩，价格下跌。

但这里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基本需求类资产，如食物、衣服等能满足基本温饱的商品；二是在基本需求之上能带来额外收益的资产，如股票、股权、收藏品等。

对于基本需求类的资产，人口的多少对其价格影响不大。全球人口在稳定增长，部分地区甚至是负增长，而全球粮食、衣服的供应也基本稳定（除贫困地区较为匮乏），因此，基本需求类的商品价格不会遭到暴涨暴跌，依然是围绕其价值在上下波动。

而对于基本需求之上的资产，供应是一定的，且天然设定了门槛。一旦人们迈过温饱跨过门槛后，多数人将争抢有限的投资方式和机会，大量的需求将推升其价格上涨；反之，价格将下跌。

这里面有个奇葩，就是房地产，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房产本身属于“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中的一项，但如今的时代中，其金融属性却远大于居住属性。在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二线城市，供应不足导致需求难以满足，房价暴涨，只能逼政府出政策打压。

## 2010 年人口净流入城市

人口净流入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趋势并未改变。虽然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入增幅变缓，但人口向如南京、天津等新一线城市，或武汉、郑州等二线城市的流入依然稳定增长。大城市有更丰富的资源和公共服务配套，有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遇，人口依然源源不断涌入，成为支撑大城市房产的基础。

## 中国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吗？

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还需要依靠更多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吗？

中国经济已然呈现出 L 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创新转型将是未来的主要发展之路。随之改变的，将是中国劳动力的产业分布。

首先，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和技术带来的革新将替代劳动是大势所趋。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大量传统工厂在关闭，机器人（或者机械手臂）将替代流水线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占据主导优势。比如富士康，其在大陆已部署了 4 万台“机器人”，而一旦技术成熟，机械劳动力推广开来，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

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不能再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和牺牲环境，而是要摒弃过去世界工厂的发展路径，这早已是共识。但那些“下岗”员工，瞬间将变成“过剩劳动力”。

其次，从劳动时间的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剩的。2015 年，有 2.7 亿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平均年龄 38.5 岁，50 岁以上的仅占比不到 20%。绝大部分农民工在 50 岁左右就返乡了。而如果按照 60 岁的退休年龄来算，这些人还有近 10 年的时间回到乡村被土地牵绊。如果把这几千万人的劳动时间再延长 10-15 年，能折算成多少劳动力？

最后，中国农村还蕴含着大量劳动力潜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行适度规模经营是必要之举。但中国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制约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也将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进入城镇。有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尚有 2 亿多的潜力可挖。但当他们进入城镇，城市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公共服务能否跟上，是另一个难题了。

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从长期看是充足的，但其在三大产业上的分布极不均衡。如就业缺口极大的服务业，你从价格日益高涨的月嫂或者家政服务就能看出。而这一情况正在好转，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先后超过第二和第一产业，未来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中流砥柱。

结束语：

新出生人口的增长，或许证明着全面二孩政策正在起作用，对改善劳动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有着一定正面影响。

但新出生人口的增加，也在制造着需求，劳动人口的增加将助推资产价格的上涨，尤其是核心城市的房价。而如何在拉动经济、维持房价、提高就业收入、减缓老龄化中取得平衡，将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

（米雷）